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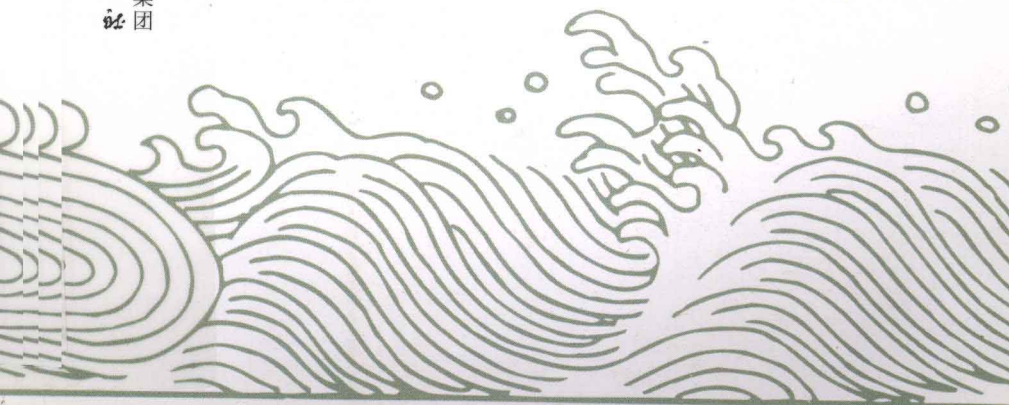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青岛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合编

近代中国与日本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Jindai Zhongguo Yu Riben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近代中国与日本』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青岛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合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陈廷湘主编.
—成都: 巴蜀书社, 2010. 7
ISBN 978-7-80752-610-0

I. ①近… II. ①陈… III. ①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文集 IV. ①D829.3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1489 号

“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陈廷湘 主编

责任编辑	侯跃生 田苗苗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11.625
字 数	30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610-0
定 价	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序 一

曾田三郎

每年9月末，是中国留学生在广岛大学研究生院完成学业将回国的时期。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很多留学生完成硕士研究生课程后已经回国。另外还有一些学生将继续博士研究生课程。到了10月份，又有来自中国各地的新留学生在此入学。近年来，广岛大学接收了很多外国留学生，其中最多的就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广岛大学的校园和研究室里，大家当然用汉语进行交流。我认为这是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体现，而最近日本政治的变化更进一步在加强这方面的友好关系。

日本和中国的紧密关系不仅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上，而且在学术上也不断发展。同样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里，很早以前就举办了国际性的学术会议。近年来，相对而言小型的研讨会越来越多。这种形式的研讨会不受约束，有利于各抒己见。2008年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会议，就是其中之一。会上作了充实的报告，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我们这样的学者来说，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学术方面的交流，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日本近代史、近代日中关系史的研究领域里仍需进一步的交流。因此，此次在四川大学举办

的研讨会，把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作为主要的探讨课题，是很切合实际的。

来自日本的五名学者，都毕业于广岛大学文学研究科。其中大部分是以我为代表的研究小组的成员。该研究小组享有日本科学研究所费的资助。研究主题为“近代中国从专制政治到立宪政治的转变以及行政体系的变化”，这个项目是从2005年开始的，为期四年。在研究的实施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计划就是和中国的历史学者进行定期的学术交流。学术交流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始的，第四年则是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进行交流。对我们来说，正值总结这四年的研究成果之际，能在四川大学举行研讨会，实在是令人喜悦。

这次的研讨会于2008年9月28日，在四川大学校园内的中国藏学研究所举行。我与参加研讨会的很多中方学者都是初次见面，但是杨天宏教授曾经在广岛大学作过演讲。另外，林敏教授和刘世龙教授曾经在广岛大学留过学，分别获得了日本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博士学位。

来自日本的五名学者和四川大学的学者，在这次研讨会上作了十四篇研究报告。这些报告，有关于近代日中关系的，也有关于中国的政治、文化、地方社会经济的研究。对于个人的发表，除了评论人的评论以外，其他的参加者也积极地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另外，四川大学内外的硕士课程、博士课程的研究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场上气氛活跃，各抒己见。

关于近代日中关系的论文八篇，涉及面广，研究对象的时期是从清末到抗日战争。从研究的主题来说，有探讨了关于清末由四川派遣的留学生，在日本的法政大学的教育经历；还有一篇分析了同样到日本来学习中国留学生，在大正时期的东京产生内心斗争等

问题。关于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政治，有一篇论文探讨了袁世凯政权时期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制度的重新调整；还有一篇讨论了中国民众对“二十一条”要求的抗议运动。有关“二十一条”的问题是今后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包括日本政府的政策立案和外交交涉的问题。关于袁世凯政权以后的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时期，有一篇论文是中日历史学者对中国认识的比较研究，这在文化史上具有深刻意义。关于其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有一篇论文探讨了为民众世界赋予秩序的时间和象征的问题，这从广泛的意义来说也是文化史方面的论文。

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后半期，有两篇论文分别从经济和政治的两个方面探讨了中日关系。经济方面的论文，分析了派遣到日本的实业视察团，并揭示出了当时上海的权势资本家的日本观；政治方面的是有关蒋介石对应“济南事件”的研究，这篇论文重新探讨了他的“不抵抗主义”。

关于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四川地区的论文一共有六篇。研究对象的时期，仍然是从清末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以清末为研究对象的论文，研究的是致力于中国富强的文化、教育、社会习惯的改革。具体来说，将围绕文字改革，缠足的论争以及教育的振兴为主题，阐明了近代改革思想、运动与传统之间发生摩擦的实际情况。有关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有一篇报告就直奉战争后政府的问题，从新的观点进行了分析。跟以前相比，近年来关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研究少了一些，但有一篇报告着眼于四川地区，在基于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分析了当地佃户的生活和生计；还有一篇报告同样以四川地区为对象，从新的角度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对农民等的征发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变化。

如上所述，本次的研讨会发表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同时

对于日本和中国的历史学者来说，还留下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加深日中两国历史学者的学术交流，当然有必要了解双方的研究成果。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国际性学会上作报告和进行讨论，从这一点来说，在四川大学举办的这次研讨会意义重大。但是通过论文和著作了解两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有些问题需要解决。现在日本的学者很容易接触到中国学者的著作和论文，这是因为中国学者的著作一旦出版，在日本很快即可以读到。与此相比，日本的研究成果好像还没能充分交流到中国的学术界。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日本学者的论文或者著作翻译成中文，并在杂志上登载或出版。但是，这只不过是一部分，不能说是充分反映出了日本历史学界的动向。今后，为了发展两国的学术交流，有必要创造共同分享两国研究成果的环境。我希望，今后能与四川大学共同发展这些方面的学术交流。

2009年10月8日

序 二

陈廷湘

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2008年9月28日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学院藏学研究所举办的“近代中国和日本关系史”研讨会是无数次大大小小中日文化学术交流中的一次。在这次研讨会上，作为正式代表的中国十四位学者和更多听众认识了来自日本广岛大学的五位日本学者。与会代表就近代以来有关中国、四川、中日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广泛领域展开了深入的研讨，进行了富有学术性的对话。

关于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具体内容，曾田三郎教授已在他的序中作了详细阐述。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历史学者，曾田三郎教授研读了参会的每一篇文章，对每位学者提交论文的要旨和主要观点都给予了简明而中肯的论断。于读者阅读本书和了解会议都颇有帮助，功莫大焉！

中日两国同处东亚，且为近邻。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两国间各种接触与交往十分频繁，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对中日两国，对整个世界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今天，这些事件和参

与事件的人物已经渐渐远去，成为历史——中日两国国人共同的历史。历史可以过去，但历史却永远不会死亡，它永远鲜活地存在于中日两国国人的心中。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留下了愉快，也留下了痛苦，但不管是愉快还是痛苦，也无论是光荣还是耻辱，它都是我们自己的历史。这一漫长的、与中日两国国人血脉相通的历史会引起两国学者永不衰竭的研究兴趣，同时，研究这一历史也是两国每一代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性责任。

在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两国史学界的前辈们已经作出无愧于他们的时代、无愧于他们的人生事业的巨大成就。今天，历史的发展已经把研究中日关系的历史责任交到了当代中日两国学者的手中。就终极意义而言，历史永远没有最后的答案，因此历史永远具有无穷的魅力，也永远存在无限广大的解释空间，每一代学者都可以作出彪炳史册的学术成就。我们这一代学者有超越前辈学者的可能，却没有落后于前辈学者的理由。加强两国学者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学术交流，推进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发展，在全新的时代用全新的眼光去重演中日近代关系史，探寻其中的奥秘，揭示其中的因缘联络，把中日关系史向“真实”推进一大步，这对中日两国、对世界、对子孙后代都具有不可限量的重大意义，也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应对自己的历史作出的交代。

2008年在四川大学举办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研讨会，在整个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也许算不上重大事件。但是，会议毕竟是中日两国部分学者为推进中日关系史研究奉献出的努力。与会的每一位学者都以严谨的态度和艰苦的耕耘著文参会，会中进行了认真的交流与论争，最后形成了这本文集。可以说，这是一本不仅展现着每位学者的智慧，而且蕴涵着每位学者心血的著述。尽管学有深浅之别，术有高下之分，但只要是用心之作，就称得上是一个历史印

记，是一个永恒！

世事似乎存在一个不是规律的规律，一件事一旦有了开始，似乎就有了继续。2008年夏，广岛大学与四川大学共同举办了“近代中日关系史”研讨会，我在会上认识了五位日本学者。2009年夏我就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挺之教授、副院长霍巍教授应邀访问广岛大学等多所日本学府。在接到正式邀请时，我正在美国访学，但我确乎把赴广岛大学等校进行学术交流看得尤为重要，立即改机返国，于8月7日赴日，重晤曾田三郎、丸田孝志等教授，并在广岛大学等学府开了讲座，以另一方式进行学术交流。有源有流，我们两地之间的学术交流可以说真正开始了。我衷心希望这一交流也如整个中日文化交流一样，从此相因不绝，不断推进，在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搭起一座常相往还的长桥。

2009年11月15日

目 录

序一	曾田三郎 (1)
序二	陈廷湘 (5)

近代中日在政治、经济、思想、 教育、文化上的互动

清末四川留日学生研究

——以日本法政大学川籍留学生为中心 … 林敏、何欢 (3)

熊希龄内阁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与日本人的中国立宪国家论

..... 曾田三郎 (20)

中国民众抗议“二十一条”运动的走向及原因 …… 陈廷湘 (43)

近代中日史家中国观异同试论

——以刘咸炘与稻叶君山为中心的考察 ……… 周鼎 (58)

1926 年访日实业视察团与“中日亲善”

——以虞洽卿的言行为中心 …………… 金子肇 (75)

1920 年代初期东亚国际秩序与中国留日学生

- 以施存统为中心 水羽信男 (93)
- 济南事件与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主义” 刘世龙 (115)
- 日伪政权与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时间与象征 丸田孝志 (166)

近代中国及四川地域政治、社会、
思想、教育、经济的状况

- 从文字变起：中西学战中的清季切音字运动 王东杰 (203)
- 晚清知识分子关于缠足影响国家富强的分歧与争论
..... 杨兴梅 (232)
- 清末四川庙产兴学及由此产生的僧俗纠纷 徐跃 (254)
- 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
——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 杨天宏 (289)
- 富足与贫困？
——民国时期成都平原佃农生活 李德英 (311)
- 1949 年建国前夕四川省的战时征发及社会变化
..... 笹川裕史 (340)

**近代中日在政治、经济、思想、
教育、文化上的互动**

清末四川留日学生研究

——以日本法政大学川籍留学生为中心

林 敏（中国 四川大学教授）

何 欢（中国 西南科技大学日语系助教）

一、甲午战争后川人留学日本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通过留学日本而学习西学的热潮。以 1896 年 4 月清政府首派 13 名学生赴日为嚆矢，至 1911 年清廷被推翻时，共有数万名中国人赴日留学^①。这股留日热潮盛况空前，远非当时中国人留学欧美可比。

四川属内陆省份。早在 1876 年的《中英烟台条约》中就有侵略四川的条款。1891 年重庆设立海关而被开放为商埠。1895 年的《中日马关条约》也规定开放重庆为商埠，并准许外国资本设厂，这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对四川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强的侵略唤起了四川有识之士的觉醒。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改良思想

^① 有学者认为，从 1896 年开始的留日运动，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至少有五万中国人在日本接受各种程度、各种类别的教育。参看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 年。

便开始在四川传播。这些新思想的传播，为四川人接受新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日后四川兴起留日潮奏响了序曲。

著名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其论著中引用“亦乐书院”（1902年改为“宏文学院”）教师三矢重松的日记，提到1899年10月，已有四川学生黄大暹就读于东京亦乐书院。另据此书记述，自1899年1月起，四川总督岑春煊等人亦开始陆续向成城学校派遣陆军留学生了^①。这是目前有关四川留日学生的最早记录。可以认为，最晚在1899年初就有川籍学生负笈东瀛了。

1901年是四川近代留学史上重要的一年。农历七月，四川总督奎俊首次公费派遣了22名留日学生^②。同年，四川主事官员令各县派遣留日学生到日本学习速成师范，并定好了官费生的名额^③。次年农历八月，四川学政吴郁生奏请筹提闲款选派举贡生员

① “明治三十二年十月七日午後三崎町1丁目2番地に移転す。（松本注——三矢氏は同年9月28日、大阪天王寺中学校を辞職して上京）午後2時嘉納君内堀雄文氏も来り学生に初対面の式をす。戴翼翬（湖北）は前より来たり、今専門学校に通ふ。鄭瑞昌（安徽25歳）は横浜領事の子、熊垓（江西17歳）黄大暹（四川17歳）李盛銜（江西19歳）の5人なり。”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くろしお出版，1970年，第48页。

“あくろ 1899年1月には南洋大臣＝劉坤一四川總督＝岑春煊直隸總督＝袁世凱からもつぎつぎに陸軍留学生をおくってきた。”同上书，第65页。

另，实藤惠秀：《中国留学生史談》，第36页中记载道：“まず、浙江省から武をまなぶ学生四人、文をまなぶ学生五人が、このとし（1898年——筆者注）のうちに来日、翌年になると、兩湖總督の張之洞・南洋大臣の劉坤一四川總督の岑春煊直隸總督の袁世凱からも、陸續として留学生を送ってきた。”

② 《前督部堂奎奏派学生赴日本肄业片》（《四川学报》1905年第2册奏议）中记载四川省第一批公派留日学生为22名。“川省事属创举，款难多筹，现拟选派学生二十二名札委候补知府李立元于八月以内带赴日本，入其国家公学堂肄业。”

另据朱必谦回忆，“（留日学生）成行则在1901年，学生派额为廿人，定期东渡，乃至超出两名，为廿二人，其后又在东陆续增加两名，为廿四人”，故此处取22人这一数据。朱必谦：《对“四川学生官费留日考订”之商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64年，第222页。

③ 四川主事官员还令各县派遣留日学生，“由地方经费开支，大县派二名，小县派一名，到日本学习速成师范，八个月毕业。社会名之曰二四生。同时，亦有自费生随之而往的。此后所派官费学生有额定，而自费生则逐年增加。”但懋辛：《清廷选送留日学生情形及留日学生与新军的关系》，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图书资料室藏，1961年。

出洋留学，其中提到：“学堂兴设之难，一曰无款，一曰无师，二者相衡，师范较难，而通知西学者尤难。蜀地偏僻，乏才更甚，自去岁奉旨选派学生出洋，风气渐开，士知墨守为非，各属举贡生员等于省城创设游学公会，拟集资斧，就学东瀛，期于速成师范，为学堂教习之用。”^①可见当时四川急需新式人才，而赴日留学，乃是造就新式人才的一条捷径。外务部批准了这一奏请并规定：“选派志趣纯正，中学已优之学生出洋。就学岁以十人为限，学以三年为期。”^②自此，四川选派留日学生有了正式的规定。

到了留日热潮接近高峰的1905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八千多名。而“四川就有七百多”^③。至1907年，《四川教育官报》记载的四川留日人数更达千余人。

众多学生奔赴东瀛，其目的不尽相同，选择就读的学校也各有所异。川籍学生选学范围广泛，涉及师范、农学、军事、政法、警察、铁道、医学、商业、造纸、印刷、染织、机械、测量等专业。其中，由于速成科时间短、见效快，故选学速成科的人数众多。从1904年5月至1908年4月的4年间，仅从法政速成科毕业的川籍学生就多达81名^④。其后的四川保路运动、立宪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等的历史证明，这批曾留学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川籍学生在四川乃至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界，从教育史的角度对留日学生的派遣状

① 《四川学政吴奏陈筹款派生出洋游学折》，邓实辑：《光绪壬寅（廿八年）政艺丛书》，光绪癸卯夏六月石印，367—368页。

② 《外务部议复四川筹提闲款选派学生出洋游学折》（光绪二十八年），《约章成案汇览》32卷下，乙篇下，第25—27页。

③ 上述但懋辛《清廷选送留日学生情形及留日学生与新军的关系》一文。

④ 根据日本法政大学史料委员会编辑《法政大学史料集第十一集 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特集》（法政大学出版，1988年）的统计。此外，还有中途退学、转学等学生，因未出现在速成科毕业生名单中，故不在统计之列。